

京西答客问

陈稚

凤凰出版社

九江学院图书馆



1547240

· 学人随笔

1597895



京西答客问



凤凰出版社

陈平原 著

32621 /
2218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京西答客问 / 陈平原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10

(学人随笔)

ISBN 978-7-5506-1475-8

I. ①京…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11650号

- | | |
|---------|---|
| 书 名 | 京西答客问 |
| 著 者 | 陈平原 |
| 责 任 编 辑 | 李艳丽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集 团 地 址 |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http://www.ppm.cn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中国江苏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邮编: 210038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9.75 |
| 字 数 | 235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475-8 |
| 定 价 | 32.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68037411) |

“出口”未必“成章”

——《京西答客问》小引

对于有“人间情怀”的学者来说,除了书斋里的阅读与写作,如何恰如其分地对公众“发言”,绝对是一门学问。面对各种或友好、或恶意、或刁钻古怪、或暗藏玄机的提问,你当然可以统统“无可奉告”。拒人于千里之外,虽可自保,却辜负了现代传媒的“大好春光”。常在河边走,又想不湿鞋,这分寸可不太好拿捏。不信,请看受过专业训练的诸多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没几年纷纷落马,就明白这活儿不容易。当然,作为学者,如果你不当红,不想赶时髦,也不将自己放置在风口浪尖,选择性地面对记者及媒体,这就好办多了。

媒体大都标榜“客观公正”,实际上自有其立场、利益及趣味,作为受访者,你只能接受这些前定的条件。惹不起的,不妨尽可能躲;编造各种理由,谢绝那些没把握的采访,这本事我总算练出来了。主要以“文章”或“著述”面对读者,机缘凑合,方才“抛头露面”,而且,还要求审读采访稿。偶尔碰到高傲的才子才女,不理这一套,你改过了,她/他照样改过去。好在一般情况下,主客互相体谅,合作还是愉快的。前提是,你对该媒体颇有了解,且无求于人,发现话不投机,随时准备撤退。如此保守的“媒体策略”,基于如下判断——传媒犹如电压不稳的高音喇叭,任何一种声音都可能因夸张而变形:弄得好,洛阳纸贵;

弄不好,就得蒙受不白之冤。若爱惜自家羽毛,希望过平静的书斋生活,还是谨慎点好。

无论中外,“问答”/“答问”都是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上的常见文体。特定场合,有人拿笔速记,有人手握话筒,有人按下了录音机,然后就是哇啦哇啦一阵主客问对。没几天,“声音”转化成了“文字”,刊载在各种报刊或书籍上,当初的“谈话”,也就水到渠成地被当作“文章”来阅读与品鉴了。其实,此类由“问”与“答”构成的“文章”,有深有浅,有雅有俗,有正有邪,很难一言以蔽之。这里涉及合作双方的意愿、时机与能力,牵涉整理的过程与宗旨,最后,编辑乃至总编都还会插一杠子,通过增删、润色、插图乃至版面语言,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因此,呈现在某一媒体上的“答问”,不全是你的“作品”——即便是书面采访或由你最后定稿。

同样是采访稿,因观察角度不同,可以是“问答”,也可以是“答问”——前者属于新闻学,后者则与文章学接壤。毕竟是中文系教授,我对撰述的“文体”颇为讲究。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序说》称:“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选》所录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至若《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则皆设辞以自慰者焉。”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则曰:“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之,乃设词以见志,于是有问对之文;而反复纵横,真可以舒愤郁而通意虑,盖文之不可阙者也。”古已有之的“问答之辞”,可以是实录,也可以是虚拟,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有无相生、虚实相间。本书各文,接近这第三条道路——确有记者采访或听众提问,但答问时颇多选择与斟酌,事后又根据录音稿整理、增删或润色。在这个意义上,“出口”并不一定“成章”。

“出口”不能“成章”的原因,有个才华的限制,也有媒体本身的

特性,比如舆论环境、话题关注度、记者素质、文章篇幅等的限制,由不得你“撒野”或逞才使气。此外,还有受访者自我保护的本能——不愿成为炒作对象,故意回避某些敏感话题;即便当时脱口而出,也可能在修订过程中“消音”。这样的“答问”,缺少精彩的“段子”,也不“大爆内幕”,更没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实在不好看。但比起新闻发言人的言不由衷、套话连篇乃至混淆是非来,学者的“答问”起码比较真诚,且言之有物。

从1985年的“三人谈”起步,对于“学术对话”的性质、功能及美感,我深有体会。不过,同样是“口说”转化为“文章”,友朋间平等且随意的“对话”,与偶然闯进你的生活、就某一话题紧追不舍,再根据录音整理的“问答”,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再好的采访者与受访者,在这种场合,多少都有点“急功近利”,不够坦然,也不够从容,汲汲于如何“圆满完成任务”,很难有高水平乃至超水平的发挥。你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不受“现场氛围”的影响,拒绝为了追求“掌声雷动”而提高声调与嗓门,尤其警惕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离谱,直到背叛自己的学术立场。

好的“答问”,绝非只是“大胆敢言”,或善于回避各种“雷区”,关键是明确的自我定位以及恰如其分的表达。我曾感叹当下中国的新闻记者普遍缺乏“文体感”(《学者与传媒》,《上海文化》2005年1期),也批评过近年大学校长致辞日渐媚俗,不太明白自己的位置以及发言的姿态(《毕业典礼如何致辞?——警惕“根叔体”的负面效应》,《南方都市报》2011年7月8日),这都基于一个假设:无论“说话”还是“撰文”,高低雅俗,端看是否“得体”。

首先求“得体”,而后才讲酣畅淋漓、回环往复、曲径通幽、别有幽怀等。重读一遍此书所收“答问”,自我评价是:基本合格,可与自家已刊著作及文章相参照,形成某种互文关系;故虽不“精辟”,但还算“得体”。

二十多年间,公开发表的“答问”或“口述”当然不只这些;可有的已入集,有的被误记,有的多冗言,删繁就简,即便保留下来的,也仍有交叉重叠处。只是考虑到文章的完整性,且为了尊重历史,不作大的增删。凡题目改动或文字上作了修饰的,文后均有说明。

为了扣紧全书主旨,副题统一成答某某问——至于有的提及姓名,有的只记媒体,并非厚此薄彼,只是记忆问题。文前文后记者所撰“题记”或“采访手记”,若非照抄“作者简介”的,则予以保留。之所以采取这些“小动作”,意在说明:“答问”不同于一般的“作文”,既受制于、也得益于主客间的配合。

感谢本书所收答问或专访的采写者及刊载者,没有他/她们幕前幕后的劳作,也就没有这册小书。

2012年2月19日撰于京西圆明园花园,2月22日改定

目 录

“出口”未必“成章”

——《京西答客问》小引 001

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

——答《光明日报》记者李春林问 001

学术史研究及其他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005

探究“文学史”的形成

——答《岭南文化时报》记者问 009

关于学术史研究

——答《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问 013

学术史·学术转型·北京大学

——答北京大学研究生王枫、毛佩洁问 015

与五四对话

——答台湾《光华》杂志社张静茹问 023

走出“话本正脉”

——答台湾《联合报》记者问 029

书的命运与人的精神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张洁宇问 031

附录一：“二十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总序 037

关注“现代中国”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张洁宇问 040

附录二：《现代中国》第一辑编后 047

有情怀的学术研究

——答北京大学研究生杨早问 050

我们的苦与乐

——答《南方日报》记者郭滨问 061

关于“散文”

——答“中国散文论坛”听众问 066

关于“经典”

——答卓越网记者问 071

精英知识分子启动民间关怀

——答《东方早报》记者杨志问 074

中学往事，那青翠的记忆

——答《光明日报》记者李玉兰问 077

报纸副刊与学者发言的姿态

——答《成都日报》记者包忠问 082

从小学生教到博士生

——答《新京报》记者陈远问 090

学术经历·中国小说·北大学生

——答台湾大学学生问 096

如何阅读《大英博物馆日记》

——答台湾《野葡萄》文学杂志社问 109

马儿啊,你慢些走

——答《国际先驱报》记者问 114

研究思路与工作计划

——答《邯郸学院学报》常务副主编康香阁问 118

书生意气长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陈洁问 126

我是个低调的理想主义者

——答《小康》记者陶卫华问 138

附录三:未必“永远”的记忆

——《永远的1977》序 142

关于《解读“当代中国大学”》

——答新加坡听众问 149

关于《作为物质文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答南洋理工大学学生问 157

经过了三十年,我们与世界思潮同步

——答《新京报》记者王爱军、高明勇问 168

这代学者的视野、趣味和水平

——答香港《文汇报》记者张俊峰问 177

附录四:“三联人文书系”总序 181

为中才定规则 为天才留空间

——答北大研究生院问 184

再学术一些,再专业一点

——答《深圳商报》记者刘悠扬问 192

中文百年,我们拿什么来纪念?

——答《新京报》记者高明勇问 197

人文学者不可丢“三气”

- 答《人民日报》记者吕绍刚问 209

中文教育在当代中国的地位和价值

- 答《中国青年报》记者黄冲问 213

铁肩担起历史使命 妙手著出现实关怀

- 答《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李杨乐问 223

既有国际视野,也讲本土情怀

- 答《新京报》“清华百年纪念特刊”问及小引 230

热火朝天不是做学问的常态

- 答《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彦武问 234

写给可能的“中文人”

- 答《中国青年报》记者何瑄问 244

1977 恢复高考,我的命运我做主

- 答《文史参考》记者周冉问 249

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 答《经济观察报》记者侯思铭问 259

文学史的教学目标

- 答《中国图书商报》记者王东问 263

“一生而历二世”

- 答《时代周报》记者李怀宇问 267

大学的责任与风格

- 答《合肥晚报》记者余琛问 284

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

- 答廉思研究团队问 290

文化思维中的“落后情结”

——答《光明日报》记者李春林问

问：在对传统文化的一番激烈批判后，最近，回归传统的思潮正悄悄抬头，一冷一热，您觉得这种交替是偶然还是必然的？

答：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中西文化的交流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这就好像瀑布，上面和下面尽管也是在交流，但地位不平等。上面可以毫无顾忌，下面则时时有被淹没的感觉。一百多年来，中国接受西方的文化很多，而中国文化流到西方则少得可怜。对西方人来讲，是西化还是中化，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中国人。这种潜意识中的恐惧感和戒备心理，使中国人难以形成健全的开放心态。一时西方文化谈多了，对传统文化冲击太大，于是便有一批人出来大讲传统文化以缓冲和平衡；等传统文化讲多了，包袱实在太重，肯定又会有一批人出来呼吁输入西方文化。如此循环往复，这一百多年就是这么折腾过来的。只要中国还没有真正富强起来，没办法真正平等地跟西方对话，这种中化、西化之争还会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不断争论下去，不过主角轮流唱而已。可悲的是，这种循环的周期实在太短了，几乎十年就一个来回。结果讲西方文化的，话没讲透就被轰下台；讲传统文化的也不例外。

问:我们喜欢把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作为一对范畴。西方文化是一种正在发展的常讲常新的文化,而传统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僵滞的文化,这两种文化的交流和碰撞,不又是一种不相称吗?

答:正是由于交流双方的不平等,使得这个世纪的中国人,在中西文化的比较分析中很容易加进许多非理智的情感因素,不是“东倒”便是“西歪”,难于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找到恰当的安身立命之处,在心平气和的兼容并蓄中创造一种新文化。这就是朋友们常在一起议论的20世纪中国人的“落后情结”。开眼看世界,发现中国太落后了,于是这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自觉地将其哲学、史学、文学、文化等方面的思考全牢牢地拴在如何富国强兵、摆脱落后这一点上。这自然无可非议,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优秀品质。但思考的对象明显地限制了思考的层次和深度。如人家在讨论生态平衡、核恐怖的时候,我们的热门话题却是温饱和物价。如果我们的理论家不适当地超脱一些,去关心一下有关人类共同命运的更有理论意义的课题,如果没有人“浮在半空”,作一些看起来没有实用价值的玄而又玄的思考,我们一代代人思考的绝对价值就高不到哪儿去。到头来,在理论建设上,我们和西方的距离还会加大,还是无法进行平等的对话。

问:无论是文化开放中的“戒备心理”还是文化思考中的“落后情结”,这都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先天不足”。说到后天的努力,我们除了等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外,主观上或者说文化研究本身是否也应有所作为?

答:少发些“中化”还是“西化”之类的空论,多做些切切实实的个案分析和思考,这是使这一次的文化热深入开展并取得成果的关键。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提出一些很有意义的课题和设想,可大都还没

有来得及展开,刚刚提起话头,兴趣又很快转移到别的更新的课题上去了。满树的桃子我们都尝过了,可就没一个是吃完的。如果回顾这一百年的学术史,西方关注的课题,我们也都大致有人提及,有的还成为一时的热门课题,可就是很少出真正的理论成果。这次的文化热估计很快就会过去,公众不可能长久地关心一个问题。可学界似乎不该跟着公众马上转移阵地,或许在一个没有成为热点的阵地上,才有可能真正探讨一些有价值的理论问题。

问:与“五四”东西方文化大论战相比,这次文化热参加的人多,涉及社会生活的面也广,大有人人谈文化的势头,这是不是文化讨论深入的体现?

答:“文化大革命”中的全民讲哲学,并没有提高中华民族的哲学素养,反而把水搅浑了,这个教训记忆犹新。要大家都能上,那就只能降低讨论的层次,把理论研究变为普及讲座。“人多未必力量大”,我指的是注重创造性思维的理论建设。眼下颇有人以全民都能谈文化为“文化热”深入的标志,我却以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很可能转而全民都不谈“文化”或谈的都不是真正的“文化”。

问:在回顾“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时,学者们常挂在口头的人物是陈独秀、鲁迅和胡适、周作人,您为什么对林语堂特别感兴趣,连续写了几篇“林语堂与东西方文化”的论文?

答:20世纪许多有出息的中国知识分子,何以由批判传统文化的斗士一转而为国学大师?真的如老话所说的,人生如过马路,先看左后看右?还是如林语堂所预言的“中国人一到四十岁,就抵抗不住父亲留下的瓜皮帽和平底鞋的诱惑”?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站稳脚跟,既坚持民族传统又追赶世界潮流?这对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来

说,无疑是个严峻的课题。林语堂以他独特的方式完成了从西方文化到东方文化的转化,这其间的利弊和得失,对今天提倡东西方文化综合的人,不无借鉴作用。

问:如果沿用今天的简单说法,林语堂既不是全盘西化者,也不是国粹派,那么今天如何看待他从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回归”呢?

答:林语堂说自己的长处是对中国人讲西方文化,对西方人讲中国文化,故“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或许是因为大部分时间身在国外,林语堂在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时,很少我上面说的“戒备心理”和“落后情结”。在社会理想层面,林语堂也讲以“不争”来破“强权思想”,但那是对外国人讲的;对中国人则不忘“民主与法制”。而在审美理想和生活趣味方面,林语堂才更倾向于东方。所以,如果说林语堂前期倾向于西方文化,后期倾向于东方文化,当然大致说得过去;但仔细分析则未必如此。我想,对好多给人“回归传统”印象的知识分子,都应该考虑其回归的契机、途径和后果,反正不会像苍蝇飞了一圈又落在原地。这也许比捧他们或骂他们的“回归”好。

(初刊《光明日报》1988年10月13日)

学术史研究及其他

——答《中华读书报》记者问

问：民间学术刊物的涌现，是90年代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你与王守常、汪晖共同主编的《学人》，是出现较早、影响较大的一种，能否谈谈当初的设想以及具体操作的经过？

答：90年代中国的学术文化格局，将与80年代有较大的差异，我想，这点很多人早就预感到了。这种学术转型，既有外部环境的诱使，也是学术发展内在思路所决定的。需要某种契机，或者说找到突破口，使得我们这些文革以后培养的“年轻一代”，有可能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当然，也不无借此影响90年代中国学术走向的野心。从1991年春天正式运作，到现在，《学人》总共出版了七辑，每辑刊登人文研究方面的专业论文若干篇，约五十万字。本来可以办得更好些，只是我们三位都有自己的研究课题，编务方面不可能投入太多的精力，不如人意处多多。

问：你刚才提到“专业论文”，又说起“人文研究”，在我理解，这两者是颇有区别的。《学人》的这一定位，是否与其厚实、持重的学术风格有关？

答：“专业论文”，很好解释，那是针对此前的“以经术文饰其政论”

或者“曲学阿世”而提的。强调学术独立,注重学理探求,将“论文”与“杂感”区别开来,这都是特定环境下的“话语”。后世或许需要注解,今人则大都能够意会。“人文研究”这题目很大,似乎与我们所标榜的专业化趋向背道而驰。其实,说不上自相矛盾。单单将“人文研究”解释为集刊的范围尚不够,我们正是希望借此穿越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边界,从事综合研究。当然,这只是意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人文研究本就源远流长,不敢轻言“突破”;再加上作者大都受过严格的学院训练,为文立说相对谨慎些,这或许就是你所说的《学人》风格趋于厚实与持重的原因。

问:我注意到,贵刊第一辑上那组《学术史研究笔谈》被不少谈论90年代中国学术走向的文章所引证;而且,现代学术史研究似乎是你们的旗帜;每辑上都有此类文章发表。你能否谈谈,贵刊选择学术史研究作为重心,有何用意?

答:说“旗帜”言重了,说“研究重心”,还可以。这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话题,三言两语说不清。学术史研究,总是有所表彰有所批评,当事人不用说,还会有许多自愿对号入座的。于是,引发不少意气之争,比如:“谁给你指手划脚的权力?”学术规则的确立与超越,是个值得认真反省的大问题。从知识增长与文化积累的角度思考,90年代的中国学界,必须调整发展战略。有几种可供选择的途径:一是直接引进新的思想观念或研究范式;一是别无依傍,独创新说;再就是选择与先辈对话,通过学术史研究逐步确立自己的立场与方法。最后一种,其实是怀疑是否存在现成的答案,希望通过触摸传统、反省传统来思考当今的生存处境与发展策略。学术史研究不是“点金术”,也没有提供“答案”,这只是一个重新寻找立足点的“过程”。始终立场坚定、没有惶惑与不安的朋友,大概很难理解我们